

商人与国家：贵族会社、藏红花行会与梅森行会

Dr Alexander Ressos, TEP
Attorney-at-Law (Switzerland), Solicitor (Hong Kong),
Solicitor (England & Wales)

1336 年的革命针对的是一个商人寡头集团，然而商人们通过新的渠道保住了通向权力的途径。在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远程贸易商人与骑士一起进入了 Constaffel。区域性商人，即出售香料、布匹、铁器和小商品的店主，构成了 zur Saffran 行会的核心，而葡萄酒贸易则主导着 zur Meisen 行会。¹ 这三个团体成为苏黎世商业精英的制度归属。它们与国家的关系，是将中世纪行会秩序与后来的金融中心联系起来的一条线索。

1 Saffran：店主行会

Saffran 行会在各行会的位次中居首。其成员最初是 *Krämer*，即出售进口商品的零售商人。行会的名称本身取自最昂贵的香料（藏红花），彰显了其贸易的国际取向。² 其行会会所上的铭文将 1418 年的所有者描述为腰带匠和商人的协会，这提醒人们 Saffran 行会也包括从事金属和皮革饰品制作的手工业者。³ 作为远程贸易与本地消费者之间天然的中间人，其成员是受城市市场规制、关税和铸币影响最直接的群体。Saffran 行会十八世纪的资产负债表中有大量对农村社区的贷款，这表明此类行会的财富到那时已从贸易转向了信贷。

2 Meisen：葡萄酒、客栈与明斯特广场

Meisen 行会位居第二。其最初的成员是葡萄酒商、客栈老板、马具匠和画师。在葡萄酒行业中，史料提到了斟酒人、葡萄酒叫卖人、葡萄酒搬运工以及经纪人。⁴葡萄酒与粮食、盐和铁一样，是苏黎世市场上交易的主要商品之一，也是该市间接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。因此，控制葡萄酒分销的行会在贸易与财政之间占据着战略位置。⁵位于明斯特广场（Münsterhof）、于 1757 年落成的巴洛克式行会会所，显示了该行会在十八世纪的财富与抱负。十九世纪，这里设有该市的官方标准钟，苏黎世的钟表均以此校准；戈特弗里德·凯勒（Gottfried Keller）也是其咖啡馆的常客之一。二十世纪，这里于 1946 年 9 月接待了温斯顿·丘吉尔，并于 1980 年 4 月接待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。

3 从手工业者统治到商人与食利者统治

商人与国家关系的长期趋势是清楚的。对于近代早期，奥托·西格（Otto Sigg）已对其作了量化。在小议会中，手工业者在 1637 年占成员的 40%，到 1790 年仅占 6%，而食利者则从 36% 上升到 58%，商人从 20% 上升到 36%。在大议会中，同一时期手工业者的比例从 50% 下降到约 17%。在 1601 年至 1798 年间任职的 135 位国家首脑（Standeshäupter）中，只有十四位是手工业者，而八十五位是食利者，三十四位是商人。⁶《瑞士历史辞典》（HLS）的结论是，布伦死后，从事贸易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日益主导政治权力的实际行使。按照该辞典的叙述，对出口企业的垄断服务于一个商人寡头集团的团体利益。⁷

这一过程远在 1519 年之前便已开始。1498 年赋予的自由选择行会的权利，使商人和食利者得以进入手工业行会并代表它们。⁸由此，形式上赋予手工业一半权力的行会宪制，成了一个商业和资本所有者精英统治城市的工具。选举实践反映了这一点。行会选举要

求宣誓选出最贤明、最优秀的人，但记录显示存在借宴席和礼物进行的贿赂，以及取消对手资格的种种手段。1582 年，新当选的行会会长贝亚特·希策尔（Beat Hirzel）因操纵选举而被免职。1629 年 zur Waag 行会的一起选举丑闻，使勒乌（Leu）家族的两名成员丧失了被选举资格，并使十一名普通成员被投入监狱，仅以面包和水度日三天。⁹

这对商人与国家关系的影响是双重的。一方面，苏黎世的商人精英不需要单独的政治组织来捍卫自身利益：他们本身就是政府。城市的关税、道路和桥梁政策、铸币以及外交，都是由本身就是商人和食利者或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决定的。当商人们确实在 1662 年创立了一个单独的机构——商人理事会（Kaufmännisches Direktorium）时，它是一个半官方组织，承担了道路、桥梁和邮政服务等公共任务。¹⁰ 另一方面，商人是在一个团体框架内进行统治的，这一框架要求他们与行会会长分享职位，寻求所在行会的共识，每半年轮换职务，并向市民共同体重新宣誓。苏黎世的商人精英固然强大，但他们以合议的方式行使权力，并且永远不会完全忘记，他们的权威建立在行会之上。商业主导与团体约束的这种结合，塑造了日后现代金融中心得以成长的政治文化。

4 注释

1. 《瑞士历史辞典》（HLS），“Kaufleute”（Martin Illi），<https://hls-dhs-dss.ch/articles/016380/2016-03-23/>，关于区域性商人的组织情况：“in Zürich hauptsächlich in den Zünften zur Safran und zur Meisen”。
2. Otto Sigg， “Zunft Herrlichkeit”（1986 年），<https://www.zuerich-geschichte.info/pdfs/Zunft Herrlichkeit.pdf>； Monica Seidler-Hux， “Die Zürcher Zünfte”， 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， 2024 年 4 月， <https://www.zb.uzh.ch/en/fokus/beitrag/die-zuercher-zunfte>。

商人与国家：贵族会社、藏红花行会与梅森行会

3. Zunfthaus zur Saffran 的历史标识牌 ,
<https://www.hmdb.org/m.asp?m=259179>。
4. Zunft zur Meisen , “ Zunfthaus” , <https://www.meisen.ch/zunfthaus> ;
Zunfthaus zur Meisen , “ History” , <https://www.zunfthaus-zur-meisen.ch/en/zunfthaus-zur-meisen/history/> ; 关于葡萄酒行业, 参见 Wikipedia , “ Brunsche Zunftverfassung” , https://de.wikipedia.org/wiki/Brunsche_Zunftverfassung , 仅供参考。
5. HLS , “ Ungeld” (Anne-Marie Dubler) , 2015 年 7 月 23 日版,
<https://hls-dhs-dss.ch/de/articles/026199/> : Ungeld 是 “ eine Verbrauchs- und Umsatzsteuer auf Wein und anderen geistigen Getränken” , 城市法将关税和 Ungeld 一并列为 “ diese beiden wichtigsten Einnahmen des spätmittelalterlichen Stadthaushalts” 。
HLS , “ Zürich (Gemeinde)” , <https://hls-dhs-dss.ch/de/articles/000171/2015-01-25/> , 将葡萄酒列为区域市场的商品之一。
6. Otto Sigg , “ Zunftherrlichkeit” (1986 年) ,
<https://www.zuerich-geschichte.info/pdfs/Zunftherrlichkeit.pdf>。
7. HLS , “ Brun'sche Zunftrevolution” (Martin Illi) , <https://hls-dhs-dss.ch/textes/d/D30735.php> ; HLS , “ Zürich (Gemeinde)” , “ Wirtschaft” 一节 , <https://hls-dhs-dss.ch/de/articles/000171/2015-01-25/>。
8. HLS , “ Villes corporatives” (Anne-Marie Dubler) , <https://hls-dhs-dss.ch/textes/f/F9917.php>。
9. Otto Sigg , “ Zunftherrlichkeit” (1986 年) ,
<https://www.zuerich-geschichte.info/pdfs/Zunftherrlichkeit.pdf>。

10. HLS , “ Kaufleute” (Martin Illi) , <https://hls-dhs-dss.ch/articles/016380/2016-03-23/>。

仅供一般参考。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，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，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。本文反映截至2026年9月的法律状况。

在线版本：cn.helveticaregister.com/zurich-merchants-and-the-state-the-constaffel-the-saffran-and-the-meisen